

梁啟超的世紀情懷

• 閻小波

一 「世紀」一詞的輸入

歐洲各國大都以耶穌降生為紀年之始，每百年指一個時代。傳教士東來後，在其出版的中文報刊大都標明公元紀年和以中國帝王年號紀年兩種。中國在變法維新期間自辦的報刊，如《時務報》等亦採中西兩種紀年，但未見有以「世紀」作為百年的紀年單位。

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於1898年底創辦了《清議報》。在該報的〈敘例〉中，梁氏第一次使用了「世紀」二字^①：

中國自古以來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後起，以扶國家之危於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英、俄、德、法、日本、奧、意乎哉？

這裏日文中一些詞彙如「支那」、「世紀」等同時出現在他的筆下。梁氏在世紀之交前夕第一次使用「世紀」一詞，即坦露了心中的世紀關懷和中國關懷。

雖不能斷定梁氏是中國用「世紀」之第一人，但可以確認的是，「世紀」二字是因梁氏之文而大行於中國。本世紀20年代末徐致靖之子徐彬講過一段頗為中肯的話：「日本譯自西洋之科學的名詞及其他學藝之術語，如經濟、倫理、哲學之類，皆為梁氏用入己文，此類譯名，即隨梁之文勢而普習於中國。嚴幾道氏雖極圖自立，創譯『講學』、『名學』、『愛智學』，然至今仍以不甚通透之日本譯名最為通行。」其原因是「梁文有力焉」^②。

用「世紀」一詞多少意味着接受以耶穌紀年這一事實，這無疑犯了中國歷來以帝王紀年之大忌。此前受西方以耶穌紀年的啟示，康有為首創以孔子紀年。

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於1898年底創辦了《清議報》。在該報的〈敘例〉中，梁氏第一次使用了「世紀」二字。雖不能斷定梁氏是中國用「世紀」之第一人，但可以確認的是，「世紀」二字是因梁氏之文而大行於中國。

1895年，康氏在滬辦的《強學報》曾以「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作紀年，這不獨遭到正統派奉今王為正朔的非議，甚至連思想較為開通的張之洞也為之震駭。若採「世紀」，紀年問題自然不能不辨。於是，梁啟超於1898年底特作〈紀年公理〉，刊於次年《清議報》。文中指出：「《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恆欲其簡，不欲其繁。」其意在淡化紀年的政治含意。他認為各國相通後，應有統一的紀年：「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為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反觀歐洲，其情形亦與中國相似：「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於一。以耶穌降生為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梁啟超強調，中國不應再以歷代帝王之年號為紀年，應「歸於一」。同時他又認為，世界各國交通以後，全球萬國應歸於一。歸於誰呢？這裏遇到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衝突。他認為這一問題有待世界各國開大會來定奪，最終定一符合「公理」的紀年法則。

梁啟超強調，中國不應再以歷代帝王之年號為紀年，應「歸於一」：「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為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於一。」他覺得中國亦宜歸於一教主，但不可歸於耶穌。中國可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③。同時他又認為，世界各國交通以後，全球萬國應歸於一。歸於誰呢？這裏遇到了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衝突。他認為這一問題有待世界各國開大會來定奪，最終定一符合「公理」的紀年法則。

面對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的衝突，梁啟超在1901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紀年〉及1902年的〈新史學·論紀年〉中均主張以孔子生年為紀年，同時將歷代帝王年號及西曆分注於其下。

值得關注的是，談及紀年時，梁氏多次講到紀年只是一「記號」。但他深知中國文化泛政治的特徵——紀年與忠君愛國聯繫一起。對此，他為自己在〈夏威夷游記〉中採西曆紀年作了辯解^④：

或問曰：「子中國人也，作日記而以西曆紀日，毋乃無愛國心乎。」答之曰：「不然，凡事物之設記號，皆所以便人耳。記號之種類不一，如時、月、日，度量衡之類皆是也。」

所謂愛國云者，在實事不在虛文。吾國士大夫之病，惟爭體面，日日盤旋於外形，其國家之實利實權，則盡以予人而不惜，惟於毫無關輕重之形式與記號，則出死力以爭之，是焉得為愛國矣乎？吾則反是。

至此，在梁啟超那裏，以西元紀年及「世紀」一詞實際上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在論及世界及中國大勢時，更多的是採西元紀年和「世紀」二字。

二 世紀情懷的勃發

梁啟超的 27
世紀情懷

作為表露世紀情結第一人的梁啟超，雖在《清議報》敘例中萌生了這一情愫，但世紀情懷的勃發還是在他生平所作的第一次世界之旅中。

1899-1900年，梁啟超作了一次太平洋之旅，自日本橫渡太平洋，經檀香山到北美（後因自力軍，自檀香山折回）。

1899年春（3月），鑒於戊戌政變後世界各地華人的愛國熱情，梁啟超擬游說各商埠的華僑捐資成立一個商會，厚集財力與人力以圖救國，並認為這是「中國存亡之一大關鍵」^⑤。年底，應美洲華僑之邀，他於12月19日自日本起程，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天抵達檀香山。

自1895年公車上書投身政治以來，梁啟超少有片刻閒暇。這次太平洋之旅為他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旅途悠閒。「素不能詩」的梁啟超在旅途中忽發詩興，兩日內竟成詩十餘首，濃烈的世紀情懷是他詩作的一大主題。

第一次出現「世紀」二字的詩作是《壯別》。「極目覽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蜮，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此詩成於西曆1899年12月27日，去二十世紀僅三日矣），風潮集遠洋（泰西人呼太平洋為遠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來日所在之太平洋，即為二十世紀第一大戰場也）。欲閑閑未得，橫槊數興亡。」詩中對時間和空間的兩次自注，實詩人世紀情懷的流露。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是詩人在1900年1月30日（陰曆臘月三十半夜時分）的作品。他忽然想起此時此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盪氣迴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⑥。

在這首豪情充溢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澎湃的心潮與貫耳的海濤相激相盪，他以一個「世界人」^⑦的目光縱覽人類歷史的走勢。他認為人類文明經歷了三個時代：第一紀由中國、印度、埃及和小亞細亞四大文明古國點燃了人類文明的曙光：「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鄰相望。」這是一個「河流文明時代」。「此後四千數百載，群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葦渡，搏浪乃持三歲糧（《漢書·西域傳》言渡西海不得風，或三歲乃達。西海，即地中海也。）」地中海、波羅的海、阿拉伯海及黃海、渤海等，成了人類繁衍的內海，歷史進入了第二紀——「內海文明時代」。五百年前，隨着哥倫布發現新大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是梁啟超在1900年1月30日的作品。在這首豪情充溢的詩中，他以一個「世界人」的目光縱覽人類歷史的走勢。他認為人類文明經歷了三個時代：第一紀由中國、印度等古國點燃了人類文明的曙光；第二紀為內海文明時代；第三紀則為大洋文明時代。



陸，「帝者挾幟民贏糧，談瀛海客多於鯽」。由此，第三紀「大洋文明時代始萌蘗」。「世界風潮至始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瞠。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秘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伋頓曲（覓得檀香山澳大利亞洲者，後為檀島土民所殺）。衝鋒我愛麥塞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繞地球一周者）。鼎鼎數子隻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

詩人凝重的歷史感不是為了發念古之幽情，而是讓國人體悟到千古未有之奇變。由河—海—洋，人類的生存空間雖然在擴大，但因競爭加劇，人類的感受越來越局促。置身於太平洋的梁啟超，深感「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歛地出沒，噴沫衝天天低昂」。風平浪靜，泛舟小溪，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鬥群戰殃。……太平洋變裏湖水，遂取武庫兼奚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費商量。」人類世界為何相食相殘，有無規律可尋呢？嚴復的身影再次出現在梁啟超的腦海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

處大洋文明時代，全球「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鼾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身為飄零之客的梁啟超，獨有世人皆睡唯我獨醒的感慨。他哀其不爭，怒其不奮，心靈的孤寂與憂憤有誰人能體悟？

梁啟超是「情種」，更是不屈的勇者。詩人拿出先民「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的氣概，蹈海搏浪，呼喚睡獅早醒，直面新世紀、直面太平洋：「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鞞。吾曹生此豈非福，飽看世界一度兩度兮滄桑。滄桑兮滄桑，轉綠兮迴黃。我有同胞兮四萬五千萬，豈其束手兮待僵！」

黎明時分，「酒罷，詩罷」，開闢中國新世紀的「蕭何」興奮地極目眺望着二十世紀的第一線曙光，「但見寥天一鳥鳴朝陽」^⑧。

三 世紀之交的中國

十九世紀以降，先知先覺的中國人始向域外（世界）投去驚異的目光，然由此再開「處士橫議」之風。然而，十九世紀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多在靜態的描述和平面的展示。而世紀之交作為「世界人」的梁啟超對世界的觀察，目的是為中國的定位明確空間和時間的參數，以確立一個切實的立足點。

中國之於世界，空間上處何地位呢？隨着歐洲民族帝國主義掀起的濁浪奔湧東來，中國首當其衝。1899年梁啟超作〈瓜分危言〉，棒喝國人，預言在世紀之交西方列強爭奪的焦點將由非洲、拉美而移至亞洲^⑨。一年後，八國聯軍橫踐京門，梁啟超認為這多少印證了他的預言。

1902年初，梁啟超作〈論民族競爭之大勢〉，將列強在亞洲的競爭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在印度，第二期「重心點專集於中國」。與第一期不同的是，日本

十九世紀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多在靜態的描述和平面的展示，而世紀之交作為「世界人」的梁啟超在1899年作〈瓜分危言〉，棒喝國人，預言在世紀之交西方列強爭奪的焦點將由非洲、拉美而移至亞洲。一年後，八國聯軍橫踐京門，梁啟超認為這多少印證了他的預言。

加入了帝國主義的行列：「今日茫茫大地，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時下的英日同盟，黃白兩種人握手以立於世界。結果，「豈非此新世紀中民族競爭之大勢，全移於東方，全移於東方之中國」^⑩。

就中國的內情而言，戊戌政變後慈禧的倒行逆施，為命運多舛的中國在新世紀蒙上了一層陰影。同期列強瓜分中國之論甚囂塵上。1899年6月，梁啟超應日本某大報之邀作〈論中國人種之將來〉，回應西方列強的分割中國之議。梁啟超認為：「凡一國之存亡，必由其國民自存自亡，而非他國能存之能亡之也。」徵諸歐、亞各國歷史，各國之興亡何嘗不是如此。中國眼前的處境雖如此前之土耳其、印度，但中國人種有自己的「特質」：一、富於自治力；二、有冒險獨立的特質；三、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四、人口眾多，物產沃衍。這是「二十世紀我中國人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的內在根據。「有此四原因，規以地勢，參以氣運，則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為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⑪

面對西方民族帝國主義的挑戰，梁啟超主張：「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⑫「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髮，而悉聽我輩之自擇。」^⑬

如何才能「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呢？「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捨新民末由」^⑭。為此，必須對國民進行民族主義教育，梁啟超認為這也是世紀之交中國教育的宗旨。「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之世界也，凡一國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風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務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採他人之可以補助我者，吸為己有而增殖之。」^⑮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以一部洋洋十餘萬言的《新民說》，率先設計了一個全方位的民族自我更新的藍圖^⑯。

民族主義之生成，除了要培植自己的根柢外，還需要域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刺激及民族英雄的示範，以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此間，梁氏寫了〈自治！菲律賓賓自治！〉，對世紀之交菲律賓人民不屈強敵的壓力而爭獨立稱頌備至。〈新羅馬傳奇〉以文學劇本的筆法，「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此外，他還作了〈意大利建國三傑〉（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等，這些作品幾使同時代中國的青年志士心往神馳，不能自己。

在經濟領域，由於二十世紀的巨靈——托辣斯已橫空出世，「產業競爭」之時代正取代「鐵血競爭」之時代。一國的強弱在於能否在產業界佔一席之地。中國當務之急，不是廣結工會，發動罷工，進行消極抗拒，而應將中國的優勢產業，如絲、茶、皮貨、瓷器、紡織等「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使歐美產業界瞠然變色」^⑰。

關於政府行為，是放任還是干涉？梁啟超認為當前中國之弊在於本該放任者卻干涉，反之亦然。他主張「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

梁啟超認為，民族主義教育是世紀之交中國教育的宗旨。除了要培植自己的根柢外，還需要域外民族主義運動的刺激及民族英雄的示範，以喚醒同胞的民族意識。此間，梁氏寫了一系列介紹世界民族英雄的作品，這些作品幾使同時代中國的青年志士心往神馳，不能自己。

放任主義者十之三」^⑩。此論雖抽象泛論，但就中國的現狀、特別是在世紀之交的處境來說，政府自當該有所作為。

四 新世紀的預言

展望新世紀，中國固然面臨着最嚴峻的挑戰，但梁啟超認為挑戰與機會並存，他對祖國的前途抱樂觀的態度，堅信中國不僅不亡，且將成為世界上的強國。

梁啟超謳歌他國的愛國志士，實是自己愛國情懷的流露。愛國主義或愛國情懷是梁氏世紀情懷的重要內容。他在檀香山之旅中寫成的〈愛國歌四章〉，一揮籠罩在心頭的壓抑、混沌之氣，熱情讚頌祖國輝煌的文明史。四章分別謳歌「泱泱哉，我中華」、「芸芸哉，我種族」、「彬彬哉，我文明」、「轟轟哉，我英雄」，四章皆以「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⑪為結語，預言祖國在新世紀繁榮強盛。梁啟超確信：「二十世紀之中國，必雄飛於宇內，無可疑也，雖然，其時機猶在數十年以後焉。」^⑫

為使處患難中的中國人看到新世紀中國的希望，1902年梁啟超特作〈新中國未來記〉，預言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將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成為國際舞台上重要的一極。在中國國慶五十年（1962）大祝典之日，世界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國表賀意，都齊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或愛國情懷是梁氏世紀情懷的重要內容。

為使處患難中的中國人看到新世紀中國的希望，1902年梁啟超特作〈新中國未來記〉，以主人翁「孔覺民」之口，「講中國何以能維新自立之原因」。預言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將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成為國際舞台上重要的一極。由於「自我國維新以後，各種學術，進步甚速，歐美各國皆紛紛派學生來游學」。在中國國慶五十年（1962）大祝典之日，世界列強「皆有頭等欽差代一國表賀意，都齊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熱鬧」^⑬。

1901年，梁啟超還以「世界人」的眼光，在〈富國強兵〉一文中預言俄、美、中將是「二十世紀世界舞台第一等重要之國」。當前俄國兵雖強，而國未富；美國國雖富，而兵未強；中國國未富而兵亦未強。但在二十世紀，俄國必將富，美兵必將強。「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拔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台，將為吾國民所專有。」^⑭同年，他在〈俄人之自由思想〉中認定俄、美、中三國欲成「大業」，必須有「大變」：「美國由共和主義變為帝國主義，俄國、中國由專制主義而變成自由主義。」^⑮

人類歷史詭譎多變。本不是預言家的梁啟超固然沒有塞萊斯那樣的知名度及引人注目。徵諸梁啟超時代的歷史，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以反滿的取向澎湃激盪，建立民族國家、「新民」、以我民族主義抵制民族帝國主義的目標未能實現，中央政府在干涉與放任的兩難選擇中走向毀滅，經濟領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也因皮之不存毛無附體。然而，歷史不都以成敗論英雄，預言亦不以末節斷是非。徵諸現實，放眼二十一世紀，舊的國際格局被打破，當今世界正趨多極化，人們驚呼太平洋世紀的到來，亞太經合組織越來越為世人所倚重。回首剛剛過去的1997年，香港回歸，中共十五大以來舉國奮力推進市場經濟、實行股份制、組建特大型企業集團等，這無論說是梁氏的睿智，抑或是歷史的巧合，我們又怎能不為中國在百年前就出現這樣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未來意識的先哲

奇才而驚奇呢？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梁啟超預言中國必將「雄飛於宇內」的期盼將逐步變為現實。

在新的世紀之交、千年之交，中國人怎樣才能無愧於梁啟超的期待？又當抱何種情懷「奔向2000年」、「面向二十一世紀」呢？

註釋

- ① 梁啟超：〈《清議報》敍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第2冊之三（上海：中華書局，1932），頁30。
- ② 夏曉虹編：《學者追憶叢書·追憶梁啟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頁18。
- ③ 以上引文均見〈紀年公理〉，《文集》，第2冊之三，頁35-37。另參見〈中國史敍論·紀年〉，《文集》，第3冊之六，頁8；〈新史學·論紀年〉，《文集》，第4冊之九，頁32。
- ④ 梁啟超：〈夏威夷游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以下簡稱《專集》），第5冊之二十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87。
- ⑤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78。
- ⑥⑧ 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文集》，第16冊之四十五（下），頁17；18-19。
- ⑦ 梁啟超：〈夏威夷游記〉：「余生九年，乃始游他縣，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沖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既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為國人；既生於世界，義固不可不為世界人。夫寧可逃耶？寧可避耶？……既有責任，則當知之；既知責任，則當行之。」《專集》，第5冊之二十二，頁185。
- ⑨ 梁啟超：〈瓜分危言〉，《文集》，第12冊之四，頁24。
- ⑩⑬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4冊之十，頁26；35。
- ⑪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文集》，第2冊之三，頁48-54。
- ⑫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文集》，第3冊之六，頁22。
- ⑭ 梁啟超：〈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專集》，第3冊之四，頁5。
- ⑮ 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文集》，第4冊之十，頁40。
- ⑯ 閻小波：〈論辛亥前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頁62-78。
- ⑰ 梁啟超：〈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文集》，第5冊之十四，頁61。
- ⑱ 梁啟超：〈自由書·干涉與放任〉，《專集》，第2冊之二，頁87。
- ⑲ 梁啟超：〈愛國歌四章〉，《文集》，第16冊之四十五（下），頁21-22。
- ⑳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1991年），《文集》，第3冊之六，頁59。
- ㉑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專集》，第19冊之八十九，頁2-4。
- ㉒ 梁啟超：〈自由書·富國強兵〉，《專集》，第2冊之二，頁80。
- ㉓ 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俄人之自由思想〉，《專集》，第2冊之二，頁60。